

中国周边的新形势与思考^{*}

张蕴岭

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荣则共荣，损则共损，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直在调整：从求生存、求共处，到强调友好相处、和平发展，再到积极主动推进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前总的形势是好的，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威胁最小、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期。以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当前出现的新矛盾，可以看到中国正处于新的百年大变局进程中。中国与周边，既要从“我的周边”来认识，又要从“周边的我”来考量，“我的周边”引导看全局，“周边的我”促使用好自己的力量。未来的周边地区是多样性与相融性并存，关系的多重性与利益的共享性并存，是多角色参与，多种利益博弈。关键是中国要增强协调能力和掌控能力，以达到聚合化异，实现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关键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周边的新形势 中美关系

中国有这么多的邻国，形成独特的周边相邻大区域，一向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周边关系。认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或称与周邻的关系），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视角：地缘、关系、利益和博弈，视角不同，关系的特征和含义也不同。地缘最直接、最深刻的含义，就是中国与邻国连在一起，共处一个区域，这是躲不掉的；关系有双边，有诸边，有近，有远，构成复杂、多层、好坏掺杂的关系层次和网络；利益各有不同，但不管有多么不同，利益都是直接的和难以割舍的；

张蕴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6月12日在《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重大问题深度关注”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至于博弈，不仅存在于中国与邻国之间，而且也有来自外部势力的参与和谋划。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着如此复杂的邻国关系。中国如何与邻国相处，邻国如何与中国相处，一直是一个难题。处理得好，各方受益，处理不好，各方受损，的确是荣则共荣，损则共损，这就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周边关系的定位

历史上，中国曾经与众多邻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一个强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构建了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结构，核心是相互尊重、友好共处，特点是以强中国为中心。不过，尽管这个秩序是靠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文化、思想、道德）来维护的，但是，中国并不去强制改变邻国，而是创建大家共处的基本原则和秩序，形成一种“以不治治之”的“天下共同体”。

近代，中国衰落，该秩序结构解体，邻国多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变为间接的，如今不少遗留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中国本身衰败，不仅没有了维持秩序的力量和能力，自己也被列强势力争夺、瓜分与侵略。在这些强国中，就有中国的强邻——日本、俄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自身的内乱结束，衰败的下行线也终于停止。不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还是经历了复杂的和艰难的调整。由于形势复杂，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处于被动。在很多情况下，是外部因素决定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特征和性质，中国则被动应对。

当然，新中国也试图努力扭转被动格局，推动新的关系发展。比如，在1950年代，中国就与缅甸、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的内核是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友好相处，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环境。这些原则具有新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观，所倡导的是一种新的平等秩序观。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弱者的逻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强大了，能否坚持这种平等秩序观，还很难说。这也许正是如今别国对崛起的中国所担心的。

事实上，由于冷战的格局，中美形成对抗；由于中苏分裂，两国成为敌对国家。冷战、分裂引起的复杂周边关系，使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中国与多数周边邻国的关系都不好，弄得中国只好到“天涯”寻找朋友。

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改革开放需要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需要开放合作的经济环境，于是，中国转变战略思维，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实行开放发展政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冷战结束后，周边的政治分裂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中国进一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政治环境，而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政策也为发展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提供了环境。这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得到了发展。一则，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二则，中国越来越成为邻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国变得强大了，与邻国如何相处？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把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放在外交工作的首要地位，提出周边是首要的战略。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发展与邻国关系的新四字方针，即“亲、诚、惠、容”，提出与周边邻国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带。

总结起来，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直在调整，在出新招。从阶段上看，第一阶段主要是“求生存，求共处”；第二阶段则强调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第三阶段则积极主动推进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以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发展为理念的“新秩序观”。

随着中国本身的发展，随着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发展，对如何认识和定位周边地区也有了新的思维和战略思考。概括起来，新的战略思考大体有两点：其一，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中国置于其中，形成一个互联互通、利益密切的大区域，这是一个大变化。它意味着，不再是线性的中国对各邻国的关系，而是全面的中国和大家的关系；其二，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带。周边是中国走向大国、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它意味着，不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全威胁的根源，而是安全的依托。2011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看法，当时还遭到一些质疑，现在官方在使用，说明已经成为周边战略的一个定位坐标。

当然，即便如此，真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由于过去的受辱历史，中国容易产生“受害者情结”，从而滋生强大后的“复仇意识”，或者“利益回归意识”，这将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提供环境。同时，作为综合实力上升的国家，中国要拓展自身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也必然会引起与大国，特别是强国的抗争

或者争夺，包括可能使用军事力量，这会引起邻国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宣示的质疑，如此等等。

周边邻国的情况很复杂、很特殊，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特点之一是与强者为邻，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大邻居、强邻居，包括日本、俄罗斯、印度，还有美国。美国虽远在太平洋彼岸，但在中国的一些邻国有驻军，航母、飞机近在咫尺，战略武器“鞭长可及”，也应算作中国的地缘邻国和战略邻国。长期以来，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源是大的邻国，它们也是在中国和相邻地区进行利益争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与这几个大国都打过仗。特点之二是众邻大多“近而不亲”，而且存在诸多争端，海上争端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同时，“历史阴影”也挥之不去。与邻国相处，处好了是友邻，好邻居金不换；处不好就成为恶邻，麻烦不断。

有人说，只要中国足够强大，邻国就会“臣服”，其实不然。如今的周边形势和关系要比“华夷秩序”时代复杂得多，性质也不一样了。中国官员提出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可亲的大国，这很不容易。国家间的邻里关系向来难处，一是有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复杂多变，磕磕碰碰；二是多方掺和，也有明争暗斗。对处在上升期的中国来说，处理与邻国发生的矛盾更复杂，不仅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智慧，需要耐心。

如今，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再侵犯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格局转变。在此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自己的耐心有多大，发展和崛起的机遇期就有多长，什么时候耐心不足了，机遇期的环境也就会遭到破坏，民族复兴之梦就很难成真了。我曾说过，一个崛起的大国，最易高估自己的力量而冒险盲动。对当今的中国来说，这个风险不是没有。中国还处在由大变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环境，这是大局，大利益定位。对这一点，要时刻牢记，保持清醒的头脑。

周边形势变化

如今，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周边地区出现新的紧张，东海、南海地区似乎有些剑拔弩张，大有发生战争的风险。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认识？各方观点分歧颇大。

我认为，固然一些矛盾存在很大的风险，对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产生很大的

影响，然而，当前总的形势还是好的。从大的局势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威胁最小、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期。对于目前出现的新热点、新矛盾，需要以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周边地区曾是主要的安全威胁源。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都是围绕政权生存、国家安危被动应对，大都是外部因素逼着中国被动应对，包括不惜开战，或者进行军事行动。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开拓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改善与亲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扩展发展与安全空间，使关系和地区秩序变动向于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改革开放的最大战略性转变，就是中国由被动应对外部环境转变为争取主动，创建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实施开放政策就是要吸引西方的投资，进入西方市场，那就要改善与它们的关系。因此，以改善中美关系为契机，中国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一大批周邻国家改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很快摒弃前嫌，实现了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新生国家、亲苏联的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到1990年代末，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一个历史性大变化。

接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实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与俄罗斯划定了边界，与越南划定了陆地边界，与印度在开展边界谈判的同时达成稳边界的共识；与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发展了周边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包括签订自贸区协定、建立合作组织等。如此一来，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关系得到大的改善，共同的利益增加，特别是经济关系，发生了大的反转，中国成为大多数周邻国家的最大贸易市场。在许多领域，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或者主导性的影响力。

然而，并非总是顺风车。中国由弱变强本身会引起多重复杂的反应，会导致地区关系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就地区关系来说，调整的基调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转变成强势中国下的关系。强势中国下的关系会使一些争端升温。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不强势的时候，对于争端，自己没有力量去管，人家也不太在乎你，可以先搁置。但强势中国就不一样了。强势中国带来了双向的反应：一方面是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必然增强。中国曾经历百年衰落，失去很多，当自己变强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把别人抢占的拿回来，对于不合理的秩序难以再忍耐，对于被迫吞下的苦果要吐出来。在中国看来，这样做并不是要复仇，而是要正位。当然，强势下的中国并不止于此，扩大利益的诉求也必然增加，亦即要拓展自己的利益空间。另一方面是相关国家采取对策，如何应对一个强势中国。各方对策不尽相

同，但在防中国上似乎有一种“准共识”，即防中国“做大”，防中国侵犯其既有利益。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必然会作多手应对，包括拉其他国家为伍，推动“准结盟”联合。

应对动作最大的是美国，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势必会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地区和世界格局形成挑战。进入新世纪后的前10年，美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反恐。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被认定在改变世界秩序格局的时候，美国就忍耐不住了，不得不调整大战略，把重点转向应对中国的挑战。为此，美国调动资源，拉拢势力，力图压制中国的拓展空间，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这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提出的背景。

日本也在进行大调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使其感到巨大压力，也感到紧张。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与一个强中国相处。自19世纪后期，日本就是亚洲的老大，二战把它打垮了，其后又迅速恢复，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强国。如今，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且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把总量差距拉大，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实力继续提升，日本有些坐不住了。搁置钓鱼岛问题本来是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时的共识，但在中国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把它国有化，钓鱼岛问题被推到了前沿。安倍晋三再次上台执政后，把中国的威胁作为推动日本国内改革、解禁行使自卫权的标靶，不惜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这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菲律宾、越南为了维护在南海所占的岛礁利益，公开向中国叫板，拉美国助威……两国国内的媒体也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耀武扬威、力图扩大权势的国家。

如果就事论事，这些问题看起来的确让人有点头疼，为何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问题，形势“急转直下”？似乎中国周边地区一下子变天了。但如果我们把周边看成一个整体，把变化放在中国由大变强的大历史发展进程中看，那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大局分析，即强势中国下的格局和关系重构，新的百年大变局进程。

大战略思考

中国由百年衰败到百年复兴的历史转变，必然对中国与周邻的关系、对周边秩序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造成关系结构和秩序构造的大反转。也就是说，中国由大变强，使周边的关系和秩序进入一个百年调整和重构的进程，而现在正处在

重构的历史长进程的关键期。

若把中国和周邻的关系，周边地区秩序中所出现的矛盾、冲突放在百年重构的历史长进程中来分析和认识，就可以看清楚实质，看清楚大趋势。

整体性和历史长进程，这是观察和认识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出发点。整体的视角，一是把中国的周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把中国自身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把周边作为一个整体，那就会发现，整体局势趋稳，包围圈并不存在，大多数国家希望维护稳定大局，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关系，几个看似威胁的主要升温热点，其扩散性也有限。可以说，如今周边的大格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威胁性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已经不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外部国家能够进犯中国，或者有能力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了。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的战略挤压，个别国家挑动事端。周边广大的地区有着中国战略和利益拓展的巨大空间，中国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同时，把中国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是变化的一个因素，而且是重要的因素，这样，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改变局势走向，而且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制约局势走向恶化，损害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所拥有的主动性，而不仅仅是被动性。

进行大战略思考，首先是基于大视野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谋划大战略。我把大战略归结为三个要点：一是利用好机遇期，把握住由大到强的发展大局；二是确保和平环境，不在周边地区发生战争；三是要有战略耐心，经得住时间和变化的考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进程还在行进之中。中国还处在发展中的阶段，所需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这个进程不能中断，为此，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是大战略思考的底线。

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即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提升，实现中国由大到强的转变。中国处在新百年的上升转变期，这是不可丧失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立足于和平发展，抓住了机遇，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丰足、政府管理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外来投资和世界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未来的机遇期与之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环境，提升的难度更大，外部的环境挑战性更强，因此，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克服更大的困难。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均居世界中后，离真正的强国相去甚远。这个国情是维护发展大战略定位的基点坐标。

不让战争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这是一个大战略设计，也是一个大战略目

标。中国百年衰败时期，针对中国的战争不断，让泱泱大国变得支离破碎。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时期，周边地区一再发生战争，有些是针对中国的，有些是中国被迫卷入的，但相同的一点是，都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拖延了中国发展的进程。不让战争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需要两个把握：一是把握住大局，增强掌控能力，有能力制止别国在周边发动针对自己或者针对邻国的战争；二是自己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冲突和争端，对邻国避用武力。

有能力制止别人发动针对自己的战争，需要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力，应该说，中国可以基本上做到这一点。今后，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军事的现代化，中国更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制止发动针对邻国的战争，尽管对此做到不容易，但还是要管，值得管。其实，过去中国也做过，如帮助越南赶走法国和抗击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等。那是被动参与，今后是要主动拒止。不让他国在自己的家门口闹事、惹事，特别是不挑起战争，这是中国变强的标志。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为做到这一点积聚力量和能力。

争端，包括领土争端，用战争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只会增加仇恨。对邻国避用武力，是强者的表现，不是弱者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赞许“化解”矛盾，追求“和解”结果，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原则。对中国来说，在弱势情况下，战争主要是被动的选择。如今，中国强盛了，提升了主动性，具备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应该是体现中国“和文化”的机遇期了。

历史上，战争的确曾经是大国、强国领土扩张的主要手段，但如今时代不同了。历史上，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守疆，但在衰败时期，中国无力守住自己的疆土。应该看到，如今，领土争端主要来自遗留问题。现在，中国未定的陆地疆界只剩下与印度和不丹两个国家。与不丹自然不会打仗，虽然与印度过去为此曾打过仗，但中印两国已就稳定边界达成协议，并开展划界谈判，显然，战争不是选项。现在，热点是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和海域。钓鱼岛问题不仅是领土问题，还涉及到力量对比、地区力量与战略格局秩序的转换。所谓“不为几块石头打仗”，不是开玩笑，而是战略性思考。因为钓鱼岛问题起于力量转换，求解还是要靠力量对比的反转。中国所要争取的是时间，因此，要有战略耐心。

至于南海问题，重要的是中国能掌控大局，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不让当事方的争端升级；二是拒止外部势力搅局；三是利用好东盟整体框架。南海问题的难度在战术上，不在战略上，考验中国的谋划技巧和掌控能力。具体分析这些争端国家，马来西亚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关系，不会闹大事；菲律宾闹事一是靠美

国撑腰，二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本质上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对抗；只有越南有着军事冒险性，只要把握住政治的主轴，规避主动使用武力，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对于南海海域的争端，尽管有九段线的历史权益问题，但可操作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争取主动性的一个举措是在适当的情况下，明晰中国对南海海域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原则立场与推动谈判的方略。

当然，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提出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出发点是中国作为上升的大国避免与美国这个守成强国发生冲突，特别是发生战争。中国这样做不是怕美国，不是屈从美国，而是基于新的战略思维，即避免沿袭崛起大国必战的定律。美国也许不情愿接这个招，但还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吗？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担心是很难消除的。同时，中国的挑战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它必然会千方百计制约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非要与中国打一仗，因为打一仗实现不了其目标。现代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无胜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打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中美之间可操作的战略空间很广，既有具体的“事务级”问题，也有“战略级”问题。只要双方可以坐在一起谈判，就会发现谈不完的问题，就会找到合作的领域，就会把感情拉近一步。

应该看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已经具备许多新型关系的特征，其中，突出的是利益的共享性增强，体现汇合利益的次区域对话合作机制建立，特别是中国成为关系变化的核心。这些新的发展总体来说对中国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的周边地区是有利的。所说中国要有自信，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有信心。

中国与周边，既要从“我的周边”来认识，又要从“周边的我”来考量，“我的周边”引导看全局，“周边的我”促使用好自己的力量。同时，周边地区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必要回到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那种“以不治而治之”的理想地区秩序也再难出现了。未来的周边地区是多样性与相融性并存，关系的多重性与利益的共享性并存，是多角色参与，多种利益博弈。关键是中国要增强协调能力和掌控能力，也就是说，尽管有差别、分歧和矛盾，但中国要努力做到让合力大于分力，达到聚合化异，实现稳定与和平。中国重新回到地区舞台主角的位置，周边地区这场历史性的转换大戏如何演绎，就要看主角的演技如何。■